

中国造园论

张家骥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國

造園師

張家驥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新登字 6 号

中国造园论

张家骥 著

责任编辑 赵世莲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路 11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25 图 111 幅 字数: 280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

ISBN 7-203-01834-2

G·831 定价: (精) 30 元

张家骥

苏州城建环保学院教授，江苏淮阴人，1932年1月出生，1956年通过国家考试，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同济大学，长期从事建筑园林规划与设计的教学及理论研究工作。

历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设计教研室主任，哈尔滨市园林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家俱协会常务理事，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建筑系系主任。

现任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建筑园林研究室主任，苏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城建学院兼职教授。



代表性著作

“试论建筑风格问题”，刊于《黑龙江日报·理论研究》1962年7月14日。

“读《园冶》”，刊于《建筑学报》1963年12期，载入《考古》1964年2期“全国考古学论著目录索引”，《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上册。

“论斗拱”，刊于《建筑学报》1979年6期。

“太和殿的空间艺术”，刊于《建筑师》1980年，第二辑。

“中国住宅建设概况”，刊于日本《早稻田建筑》1981年，21期。

“西周城市初探”，刊于《中国科技史论文集》1983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刊于《建筑师》1984年，第21辑。

“中国的空间概念”与同济大学罗小未教授合著，刊于《社会与空间》1985年12期（英、意文版）。

“圆明园造园艺术的创作思想方法”，刊于《新建筑》1987年，2期。

“中国造园艺术的创作思想方法——借景论”刊于《建筑与城市》1990年7月。（中、台、澳合办）。

论著《中国造园史》（50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主要设计工程

“山西天龙山石窟风景区规划设计”技术顾问。

“江苏高淳《潘家园》”规划设计者。

“福建长乐《塔山公园》”规划设计者。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JIA-JI, Professor of Architecture and Garden of Suzhou Institute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fessor Zhang was born in Huaiyin, Jiangsu Province, in January, 1932. In 1956 he passed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and graduated Tongji University at the top of class.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ork on architecture and garde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for many years.

He worked as dean of the architec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Harbin Archite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Institute, and also as dean of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Suzhou Institute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Harbin Garden Society, standing committee director of Furniture Society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Now he is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and chief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Garden Research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 standing committee director of Suzhou City Sciences Research. He is also a Part-time professor of Shanghai Collage of Architectural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Chief works of Professor Zhang:

PAPERS:

1. "An Approach to the Architecture Style", the Heilongjiang's Daily (Special issue of theory research) 14 7 1962
2. "A Survey of the book 'Garden Building'", Architecture Journal XII, 1963, and Archaeology II, 1964 Catalogue Index to Archaeological works in China; Reference Material Index to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Vol. I
3. "On Wooden Bracket Cluste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Journal VI, 1979
4. "Spatial Art of the Hall of Supreme Harmony", Architects Vol. 2, 1980
5. "A Survey of Housing Building in China", Japanese Journal Wazeda Architecture XXI, 1981
6.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 Citie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rchitecture: special issue),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3.
7. "Spatial Arts of Dule Temple, Guanyin Pavilion", Architects Vol. XXI, 1984
8. "Space Concepts in China", (in coordination with Prof. Lue Xiao Wei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ety and Space) edited by the Americans and Italians, XII, Both in English and Italian, 1985
9. "Ways of Art Creation Ideas in Building the Yuan Ming Yuan", New Architecture II
10. "The Art of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ing",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VII, 1990

MONOGRAPH:

"History of Chinese Garden Building" (500,000 words), Heilongjiang Peoples Press, November, 1987
Landscape planning of Tean Long Mountain in Shan Xi Province. Technical consultant
Planer and Designer of Pan Chi Garden Gao Chun County Jiang Shu Province
Planer and Designer of Pagoda Mountain Park Chang Le County Fu Jian Province

序——

继《中国造园史》之后，张家骥先生的又一力作《中国造园论》问世了。这两部巨著是珠联璧合的姊妹篇，堪称中国园林学上的史论双峰。我应张先生的要求为本书作序，虽然明知力不从心，但却很高兴有机会向广大读者毫无保留地谈谈自己的读后感。

一 背景广阔 画面鲜明

中国的园林学之所以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狭小天地里，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不能从充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来突出园林学这幅主景画面。格式塔心理学关于图形与背景的原理看似单纯，含意却颇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功夫在诗外的名言也启发人们的为学之道，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巡视一番已有的中国园林学论著，或从文学艺术，诗情画意而论其意趣；或从王公生活，文人爱好而论其功能；或从曲径通幽，小中见大而论其手法；或从亭台楼阁，掇山理水而论其构图。虽不乏高论，却难出前人樊篱。张先生的著作突破了前人的局限性，应用全息理论来研究问题，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与园林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剖析，既从微观到宏观，又从宏观返回到微观，全方位地观察与思考。在张先生笔下，文化、历史、哲学、美学、社会、经济、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宗教、考古、文献、文字各学科博引广征，信手拈来，古今中外，皆为我用，文思泉涌，下笔有神。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先生是个身体力行者。读他的书，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位“蛀书虫”的学

者形象。

二 汲深勾沉 海底探宝

研究园林学从深度上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的研究，仅考证形式制度，纹样做法，相当于西方所谓“居住之机器”的范围；中层的研究，则探讨空间组合，构景规律，提高到了“凝固的音乐”的水平；深层的研究，紧抓注意境神思，文化哲理，揭开那“石头的史书”的奥义。或者另打个比喻，研究一朵花，必须从枝叶干茎再寻根究抵，方能窥其全豹。张先生本书的特点主要是紧紧抓住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宇宙人生观；无往不复，往复无尽的时空观；儒、道、释互渗互补，以小农血缘家族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特点；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思与境偕，道与艺合的文艺创作理论。这一切又集中体现在园林艺术上形成一种文人写意自然精神的象征表达方式，从而得出中国园林与西方或外国园林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园林是中国哲理与文化的浓缩型载体，正如西方人体雕塑是西方智慧与文化的典型符号；中国园林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颂赞诗，西方雕刻是天人分立，征服自然的宣言书。从深层意义看，中国园林的佳作杰构是江南文人的私园，哪怕只有片山勺水，其意境之深远比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就在于中国园林艺术的精神“不仅是景的视觉无尽，更为重要者是在境的无终”。因此，任何堆金砌玉、铺陈排比的场面正如金碧山水、工笔花鸟一样，不如逸笔草草、虚处传神的水墨写意更富于意蕴。清代恽格《瓯香馆画跋》云：“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绝俗故远，天游故静。古人云，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其意安在？”这一问问得好，正如张先生指出的，不理解中国写意山水园真意的，绝不可能造出好的佳构杰作来。这就是为什么《园冶》中反复强调造园意匠以及意在笔先的道理。

三 高瞻远瞩 溯源顺流

中国钻故纸堆的人，往往为故纸的海洋所淹没。他们在浩如烟海的古文化宝库面前惊呆了，匍匐在古人膝下，成为抱残守缺的“国粹奴”。原因是，他们不谙时代智慧，没有用当代人类的新理论武装自己。张先生不仅博古，更为通

今；他把握了当代新学科的精神，站在人类智慧积累的新高峰上，可谓登泰山而小天下，胸怀全局，溯源顺流，看历史的来龙去脉，知传统之过去未来。因此，他一方面批判了那些貌似激进，实则对传统浅薄无知者企图割断传统的作为，同时又批判了食古不化，以古代今的复古者的观点。世上既无无源之流，也没有无流之源。张先生深刻地指出：

传统是时代的传统
时代是传统的时代

多么言简意赅的辩证语言啊！

四 严谨考据 精密论证

本书作者不仅视野广阔，论点鲜明，而且每论一题，无不尽可能荟萃古今中外各家之言，加以评述比较，以求得出超过前人一步的新认识。例如，关于文化的界说，传统的解释，园林的定义，意境的蕴涵，均可作为治学严谨精密的楷模。特别是对中国文艺美学的最重要范畴“意境”的论述，从哲学、美学、文学、宗教、艺术、画论而园林学，层次分明，条分缕析，将一个前人把握不定的模糊概念讲得头绪清楚，涵义透彻。这一概念的形成远溯到先秦经典，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直到清代才正式诞生，到现代才有学者专门去研究。张先生的研究在现有水平上又提高了一步。这个人人都在讲、都爱讲、都常讲的术语，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经张先生一番苦心疏理，其文脉已清晰如鉴。然而，这工作实不容易。即以本书对《周易》的引证而言，可以看出，对历来研究《周易》的主要成果张先生已通晓神会。古人皓首穷经，往往不得要领，甚至误入歧途，原因是缺乏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训诂学等正确全面的理论基础和辩证的、系统的方法。今人掌握了这些理论和方法，结论就越来越准确。在此，我想从张先生研究从《周易》到“意境”的形成，又从意境的涵义到园林的意境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明，以往的中国园林学之所以不能深入虎穴，得其三昧，就在于对中国哲理尤其是众经之首的《周易》缺乏应有的修养。可以说，全部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柢就在于此。曾有人说，不明中国画理，就不懂中国造园学。我想说的是，不明中国哲理，就不会懂中国造园学，而不明《周易》，则无从谈中国哲理。因此，本书的精华与要义就在于“中

国造园艺术的意境论”一章。

五 方法多元 慧眼独具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这也许可以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方法论的片面与贫乏必然导致结论的偏颇与短见。例如，何新先生写《诸神的起源》一书，偏爱训诂学方法，又专取音训一法。最近何先生又出了新书《龙：神话与真相》，仍然情不自禁地更专守一法。诚然，何先生考证了浩繁的资料，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及的领域，为学术开拓了新路，可谓神话学中一位怪才。但是，我宁愿倾向于方法多元，十八般武器都用，所以，我更赞扬张先生的做法：思辩法、实证法、系统论、全息论、结构主义、解释学、比较研究、文献学、训诂学……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发现者往往是方法多元，思想灵活，目光敏锐，独具慧眼的人，在人人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的地方看出点新东西来。例如，应用文献学方法，考查了历代园的名称沿革后，张先生发现从园名沿革中“反映出特定时代园居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造园有着不同的类型或模式，”“反映在造园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据此，园林史上许多模糊观念，错误猜测得以廓清。另一个生动而精彩的例子是对“亭”的微观研究，历来的学者专注此事者颇不乏人，亭子的样式也收集了百种之多，其成绩堪称大观，为人们提供了宝贵资料。然而，从亭子的空间意义却理解到“吐纳云气”的宇宙生命哲理，将古人片断分散的一得之见汇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认识到小小一亭竟能吞吐万象，统摄乾坤，达到画论之画龙点睛，全神凝聚之境界，却只有张先生深明哲理才能达到此境。张先生在书中写道：

中国的“亭”，在形象创造上，可说是集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它运用了古代建筑最富于民族形式特征的屋顶精华，从方到圆，自三角、六角到八角，扇面、套方、梅花、十字脊、单檐、重檐、攒尖挺拔，如翬斯飞，形象非常丰富而多姿，气势生动而空灵……

中国的“亭”，在造型上，它充分地表现出传统建筑的飞动之美，静态中具有动势的美学思想；在空间上，它集中地体现了有限空间中的无限性，也就是“无中生有”的“虚无”的空间观念。

庄子说：“唯道集虚”，正由于“亭”的集虚，才有“纳万境”的独特妙用。

这一段精辟的论说启发我们，“亭”这种中国园林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形式是老庄哲理最有效的艺术载体——或者说是通过艺术而表现哲理的最佳符号。当然，这种哲理是已经感情化了的，而不是说教。古人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然而，张先生的慧眼，替我们找到了被我们忘却的“言”，更唤回来那“言”后隐藏着的深意。古人曾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信哉斯言。

六 卅载辛勤 半生心血

巨著问世，字字珠玑。然而，其得来之不易，却鲜为人知。近年来，张先生日以继夜，几乎无休止地在工作。一个月前，我接到他的来信说：

我终于如三峡纤夫一样挣扎（的确如此）着昨天全部完稿。写完最后一句，突然一阵头晕，在椅上躺了一会。本想看一遍，修改字句，也不行，就算了。眼睛再不休息也得坏了，一写字就模糊，昨夜倒真正的睡了半年来第一次熟觉，梦也无力做了，真如小死……

这是一种学者的献身精神，是中国人所讲的“痴”，是西方人所讲的“下地狱的勇气”。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张先生卅年如一日地悄悄地在钻书堆，爬“格子”，孤灯独守，寒窗伏案，耗尽半生心血，献出两本奇书。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张先生治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我与张生素昧平生，但却久为文友。《中国造园史》问世后，我们开始书信往来。1989年10月中国建筑师学会成立大会在杭州花港饭店举行，我出席了会议，张先生也在此时到了花港饭店，但因事先未取得联系，使见面之机会失之交臂，深以为憾。现在，当我执笔为《中国造园论》写序之际，有感于张先生卅年辛勤，半生心血为中国园林学所作的贡献，以及古人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心向往之，情不自禁，以拙诗一首，志于序末，云：

负笈海上意翩跹，江南幽境甚留连。

神游山川几万里，梦绕泉石三十年。

皓首作《论》知往复^①，潜心著《史》悟园林。^②

寒山寺外残月夜，枫园灯火照无眠。

注:

①张先生在著作中引用《周易》:“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哲理阐释中国园林空间哲理。

②张先生《中国造园史》、《中国造园论》二书均贯串着注①中所讲到的深邃哲学意义。中国园林空间之真谛,非悟其本源,难窥其堂奥。

艾定增

1990年8月13日

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园林系

传统的园林文化与 研究园林的传统思想（自序）

对传统的园林文化，视为帝王贵胄、达官显宦奢靡生活产物的封建糟粕，从而一概否定者有之；视其为中华文明的精粹，国之瑰宝，全盘肯定者亦有之。究其实质，两者形色虽异，却都是根植于缺乏辩证唯物史观思想贫脊的土壤之中，永不结实的花朵。这就是我国造园学界，长期形成理论上极为贫困的原因。

问题的麋结，首先是对传统园林文化认识上的偏颇。中国历史上的造园，从秦汉时代的帝王苑囿，到明清时代的私家园林，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生活享乐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造园艺术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最大的不同，它首先是个物质构成的生活环境，是财富。在以往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只有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踞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满足其物质生活的享乐与精神上的欲求，才有条件建造这种文化上高层次、经济上高消费的园林。所以，中国古代造园必然是体现封建统治者的生活方式，充分反映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要求。

但是，造园是一种社会实践，具有两方面的社会意义：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定条件，历代园林多出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诗人画家之手，融合了古代灿烂文化中思想艺术的精华；另一方面，任何社会没有劳动者的生产活动都无法生存，造园必先生产。因此在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高度成就中，凝聚着历代工匠和劳动者的血汗和智慧，这就是以往的历史。

长期以来，人们对古代园林所体现的封建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视为“糟粕”而加以否定。殊不知这些“糟粕”的东西，正是决定中国园林艺术形式的

生活思想内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恩格斯所说：

自从各种社会阶级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①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园居生活欲求，就不会有中国的园林和传统的园林文化。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一，不论对它是褒是贬，是肯定还是否定，也丝毫改变不了历史的客观存在。

在狭隘的阶级偏见的思想禁锢下，过去研究中国造园者，讳言园林的内容，只谈形式，加之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从感性直观的景象，分析园林的空间意匠和艺术手法。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是合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到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②因为，不讲园林的内容，就不了解其形式产生之所由，也就看不到历史上的造园实践，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即有它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园林在形式上之所以有其时代的特征，正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发展的。

单从形式出发去研究中国园林，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园林尚有遗存实物可见，再早的均已堙没不存，只能凭藉文字记载的材料。而古籍所载大多是阔略而无征，散漫而难究的。从文字很难看出园林在形式上的变化，无非是池沼竹树，亭阁楼台而已。从而造成以往研究园林的文章专著，分不清唐宋园林与明清园林有什么质的不同，似乎中国自有园林，就历来如此，只有大小繁简之别，规划布局的不同而已。这就不仅是歪曲了历史，实际上是抹杀了中国造园还有它的发展历史。甚至有权威学者宣称：“中国造园根本没有历史”的惊人之论，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任何事物的内容与形式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内容必有其形式，形式必反映其内容。把内容与形式主观地割裂分离的研究方法，只究形式，非但说不清形式，也必然会歪曲了内容。在造园学领域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秦汉苑囿性质的认识了。以往研究中国造园者，多按古籍辞书的文字解释加以发挥，如：《说文》：“苑，所以养禽兽。”段注：“今之苑，是古为之囿。”又：“囿，苑

之有垣也。一曰所以养禽兽曰囿”。《诗经》毛萇注：“囿，所以域养禽兽也”（较有垣之囿，扩大了空间范围）。《三辅黄图》卷四：“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之牧马处为苑”。从这些解释，苑囿并无娱游的内容，也不包含后世造园学的意义。

汉代太仆牧师所管辖的三十六苑，是为军事需要的“军马场”性质。汉代桓宽在其名著《盐铁论》中，所指“园池”、“苑囿”一词，既与狩猎活动无关，也没有休憩观赏的意思，而是从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但以往我国造园学者据《说文》、《诗经》文字解释秦汉苑囿，广袤数百里，是为了域养禽兽，供帝王狩猎娱游之用。这种说法，多年来几乎成为定论。

而秦汉苑囿如此规模之大，并非如今所指，那种未经人化的自然原始森林保护区，它是地近京畿，农业生产发达的膏腴之地。如果有点经济学的概念，就不难想象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早期，帝王为一己之私欲，去毁掉七八个县的大量农田和山林，去豢养禽兽供狩猎娱游之用了。

任何社会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经济的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正是它赖以形成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秦汉苑囿，规模之庞大，内容也十分复杂，用现代汉语的说法，其中除了离宫别馆以外，它包罗有动物园（兽圈）、植物园、果园、菜圃、林场、矿场，以及竞技场和各种游乐园等等。实质上，**秦汉苑囿是帝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领地，正是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加以开发成为供帝室娱游观赏的苑。**这种造园与生产结合的特殊性质，是同秦汉时代帝室与国家财政分开，即分别运筹管理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是奴隶社会食采邑俸禄制的沿袭与残余，是属封建社会早期的一种“自然经济的山水官苑”。^③

秦汉苑囿中盛行供狩猎域养禽兽的官观，如班固《西都赋》有上林苑的长杨榭（亦称射熊观）“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杂获”的描写。这种冬狩活动，也并非产生于帝王娱乐观赏的需要，据研究《周易》学者宋祚胤的考证，爻辞中的“南狩”和“南征”，都是说向南方用兵。“因为‘征’可以讲成征伐，而‘狩’的本义虽然是冬天打猎，但打猎和用兵在古人却看成是一回事。”^④所以苑囿中养禽兽供狩猎，同开凿昆明湖练水军，起初都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

由此可以说明，不承认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不把造园实践置于广泛的社会生活背景上，和历史发展的运动过程中去考察，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民族

的文化传统，更谈不上科学地揭示出中国造园的历史发展规律。

对传统建筑和园林文化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开拓者和先驱们不得不采用考古学的方法，从古代建筑法式和型制的考证入手。我国先辈建筑家梁思成、刘敦桢、童寯、杨廷宝教授等为此付出毕生的精力，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光辉业绩不可泯灭。但在建筑、造园史学中，却形成以建筑考古为正宗的传统思想，视非考古式的研究为无据而浅薄，不登大雅之圣堂。

当然，用考古和考据的方法弄清古代建筑的型制和法式，不仅必要，而且非常重要。问题是法式和型制本身还不是历史，仅是研究历史的前提之一，是不可少的史料，它只能为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奠定基础。当研究跨入历史的门槛以后，单以考古学的方法就很难前进一步了，因为这种研究思想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重在形式方面，虽能说明这“是什么”！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基本上是静止的非动态的研究方法，常忽略了建筑的本质——空间，这个随时空在不断变化的活跃因素，甚至对构成空间的物质实体——构架及其构件的演变，也难作出科学的合乎规律的解释。

以往，在我国建筑史学中通行的斗拱蜕化论，就是只见斗拱的形式由简而繁，由结构构件演变为装饰构件的局部现象，却不见斗拱与整体构架间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关系，斗拱结构作用的消失，正是构架体系整体结构发展的结果。由于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想方法，形成明清建筑不如唐宋的历史倒退观念。^⑤

建筑和园林，首先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生活资料，消费时间很长，若非天灾人祸的毁坏，一般可达数十年、百年、数百年以至千年之久，日剥岁蚀必经不断的维修、翻建或重建，绝不可能全部是原貌和原物，往往渗透了多代的工程技术成果。所以，单从遗构实物和文字考据，鉴定古建筑的年代，也难免失误。

多年来为建筑史学界认定为金代的古建筑，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摩尼殿，就是断错时代的一个典型例子。十多年前，我在研究古建筑构架空间与活动空间的矛盾中发现，摩尼殿与山西太原晋祠的圣母殿，有着内在的同一性，虽然两者的外部造型和内部空间看来毫无共同之处。摩尼殿四面抱厦，造型雄厚而朴实，内部空间封闭而幽冥；圣母殿廊庑周匝，造型雄飞而钜丽，内部空间开朗而豁敞。但是，两殿构成空间的间架结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不同处是：摩尼殿全部柱子落地，形成内外槽两部分空间，除四面入口抱厦，外墙不辟窗

牖；圣母殿则减柱十八根，将内外槽间墙与殿堂外墙合二为一，从而扩大了殿内的空间，目的是为了了解决在殿内陈列数十躯侍女塑像的空间要求。

根据我的看法，任何时代的建筑实践，人们所要求的生活活动空间，与物质技术所能构成的空间始终存在着的矛盾，也是建筑实践的一个主要矛盾，正是这种不断解决和产生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建筑学和结构技术等科学的发展。从这个观点看，就不难发现摩尼殿无论在结构技术和空间意匠上，都落后于圣母殿。因此推论摩尼殿的建造年代，不是晚于宋构的圣母殿，而应是比圣母殿更早。

1977年我在撰著《论斗拱》论文中^⑥，曾提出摩尼殿定为金代之谬，应是宋初的遗构。对我这种非考古式研究，建筑史学界的“权威”学者们不以为然，也不值一顾，是意料中事。意料之外的是，在文章待刊之中，河北邢台地震，摩尼殿被震塌一角，震后进行翻建，在拆下的斗拱构件上，发现了宋初工匠题字，这个无需论证的确凿证据出现，才使摩尼殿的建造年代得以纠正，我的文章也就于无声处随之出现。研究建筑历史若要靠死人出来说话，科学对于历史就是多余的了。

在古典园林研究中，若按当时所记文字同今天的遗存实物对照，如元代的苏州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等，都非原建时旧貌。明显的差别，是园林的建筑密度增高，庭院多了。这种变化却反映出个深刻的社会内容，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的生活空间日趋缩小。反映在造园实践中是园林规模的缩小和原有大中型园林建筑庭院的增多，说明园林的“可居”已发展为住宅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居住生活园林化的结果。这同唐宋时代的私家园林与居住生活分离，以“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建锦厅，造广榭，只是为了满足园主“宴集式”娱游的园居生活方式的需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⑦要透过园林建筑庭院增多的现象，看到造园在内容与形式上质的变化，单靠建筑考古和文字考据，是难以做到的。

这些问题，说明什么呢？笔者深感恩格斯曾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传统在思想体系的所有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这种历史的堕力，必须打破。但要打破的不是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传统园林文化，——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要打破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形成的传统思想方法，即囿于形式的考古式研究，和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反对把传统园林文化，统统视为封建的糟粕，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虚无主义倾向；也反对把传

统园林文化，视为神圣的典范和恒古不变的模式，只能去复制和再版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我们要弘扬中国造园的文化传统，首先要了解传统。要真正的了解它，就要不惜以消耗大量生命力为代价，去深入的研究！今天的造园实践，大都凭经验而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总结和指导，模仿者众，创造者少，重形式者多，有“意境”者甚微，谈的是传统园林文化，却极少了解什么是“传统”？如叶朗在其《中国美学史纲》中所说：

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方面的著作却很少。到了明清两代，由于园林艺术有很大的发展，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关心这门艺术，甚至亲自从事这门艺术，这才陆续产生了一些有关园林艺术的著作。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计成（1582~?）的《园冶》（成于1631年）、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李渔《闲情偶寄》中的《居室部》和《种植部》。但是，从美学的角度看，这三部著作的理论性都很差。无论是明代或是清代，都没有出现一部系统的园林美学著作。^⑧

上列三部著作，实际上只有计成的《园冶》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造园学专著，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等，在明清笔记类之中，涉及造园的内容较多，都非专论造园之作，更谈不上系统的造园学论著了。但其中不乏精辟之论和独到的见解，是研究中国造园不可缺少的资料。此类古籍甚多较重要的如早期的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南北朝时谢灵运的《山居赋》、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唐白居易的《太湖石记》、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张岱《陶庵梦忆》、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等。还有历来的大量园记之作，虽然多阔略而无征，散漫而难究，但对了解历史上的造园思想和创作实践情况，都是必读的书。但就这些与造园直接有关的文字，还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仅此也得下一番苦功去艰辛的扒剔呢。

迄今之所以尚无一部系统的中国造园学理论专著，不仅说明我们对传统的造园文化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想方法上，还没有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我用数年前所写的未发表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正是想说明我的观点和研究思想方法，以便向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求教；对读者阅读本书也会有所帮助。